

理学智慧

与 人生之乐

李煌明 著

“孔颜之乐”论的历史考察

理学智慧与人生之乐

“孔颜之乐”论的历史考察

李煌明 著

●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邓仁娥

封面设计:曹 春

责任校对:湖 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学智慧与人生之乐——“孔颜之乐”论的历史考察/

李煌明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3

ISBN 978 - 7 - 01 - 008760 - 3

I. 理… II. 李… III. 理学—研究 IV. B244.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9889 号

理学智慧与人生之乐

LIXUE ZHIHUI YU RENSHENG ZHI LE

——“孔颜之乐”论的历史考察

李煌明 著

人 人 书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9.125

字数:200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08760 - 3 定价:2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绪论	(1)
一、对象与任务	(1)
二、态度与方法	(6)
三、选材与结构	(10)
第一章 “孔颜之乐”论的理论来源	(13)
第一节 儒家经典与“孔颜之乐”论	(14)
一、《论语》——“孔颜之乐”典故的来源	(15)
二、《周易》——“孔颜之乐”的思维模式、人格理想与 终极信仰	(18)
三、《孟子》——“孔颜之乐”的心性修养论	(22)
四、《礼记》——“孔颜之乐”的修养工夫、理想境界及 礼乐关系	(29)
第二节 佛、道思想与“孔颜之乐”论	(37)
一、无为至乐与“孔颜之乐”	(39)
二、成圣与成佛	(42)
三、“圆融无碍”与“理一分殊”	(50)
第二章 “孔颜之乐”论的兴起	(57)
第一节 周敦颐与诚者之乐	(57)

一、“无极而太极”的争议	(59)
二、诚者之乐的理论基础：“自无极而为太极”	(67)
三、诚者之乐	(70)
四、“极高明”与“道中庸”	(73)
五、“物”与“神”	(79)
第二节 邵雍与中者之乐	(81)
一、中者之乐的理论基础：“道为太极”、“心为太极”	(83)
二、中者之乐	(89)
三、“观”与“忘”	(101)
四、“时”与“宜”	(107)
第三节 张载与孝者之乐	(114)
一、孝者之乐的理论基础：“太虚即气”	(117)
二、孝者之乐	(124)
三、乐天与忧世	(127)
四、“大我”与“无我”	(130)
五、“弘大与谨敬”，“诚明与明诚”	(134)
第三章 “孔颜之乐”论的发展	(139)
第一节 程颢与仁者之乐	(140)
一、仁者之乐的理论基础：天人本一	(141)
二、仁者之乐	(145)
三、“大我”与“无我”	(149)
四、“极高明”与“道中庸”	(155)
五、“习心”与“客气”	(157)
第二节 朱熹与礼者之乐	(160)

目 录

一、礼者之乐的理论基础：“理一分殊”	(161)
二、“以道为乐”与“道中之乐”	(168)
三、礼者之乐	(175)
四、“实”与“虚”	(181)
五、“吾与点也”与“鸢飞鱼跃”	(183)
六、“命”与“乐”	(190)
第四章 “孔颜之乐”论的转折	(195)
第一节 陈献章与自然之乐	(196)
一、自然之乐的理论基础：心理合一、自得即道	(198)
二、自然之乐	(202)
三、曾点气象与孟子工夫	(212)
第二节 王守仁与本体之乐	(216)
一、本体之乐的理论基础：心即理	(218)
二、至善与无善，不动与无动	(221)
三、乐是心之本体	(228)
四、勉然与自然	(231)
五、光景与真乐	(235)
第五章 “孔颜之乐”论的流变	(238)
第一节 王艮与安身之乐	(240)
一、安身之乐的理论基础：天理即天然自有之理	(241)
二、“天理”与“乐”的本体	(244)
三、“良知”与“乐”的工夫	(246)
四、“安身”与“乐”的核心	(249)
第二节 罗汝芳与赤子之乐	(254)
一、赤子之乐的理论基础：我心即天，天即我体	(256)

理学智慧与人生之乐

二、“赤子”、“天心”与“乐”的本体和核心	(263)
三、“天理”、“人欲”与“乐”的工夫	(267)
四、“浑沦顺适”与“乐”的特征	(273)
参考文献	(282)
后记	(285)

绪 论

一、对象与任务

本书以来明理学中的“孔颜之乐”论为研究对象。“孔颜之乐”论和“孔颜之乐”问题、“孔颜之乐”三者既有联系，也有差别。此三者都有广义和狭义二层含义，从广义上看，三者可视为相通，甚至相同，但从狭义上说三者还是存在差别的。^① 本书主要从狭义上使用以上三个概念。

“孔颜之乐”的核心是“乐”，其对象是指孔子、颜回二者之乐，属于孔子和颜回二者人生哲学思想研究的领域，是先秦儒学研究的课题之一，以《论语》为主要文本。“孔颜之乐”问题，并不是泛指所有涉及“孔颜之乐”的内容，而是专指理学开山祖周敦颐对二程提出的“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②这一问题，

① 狹义上，“孔颜之乐”主要是以《论语》为文本和原旨，采用的解释学说主要是文本论、原旨论和从严解释论；广义上，“孔颜之乐”也可指超出文本和原旨的解释，也就是非原旨论观点。同样，“孔颜之乐”问题，狭义上专指周敦颐所提出的“孔、颜所乐何事”问题；广义上，“孔颜之乐”问题包括了所有涉及“孔颜之乐”的问题，上至《论语》，下至现代人的研究都属于此。

② 《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二先生语二上·吕与叔东见二先生语》，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6页。

是把“孔颜之乐”作为一个问题加以提出和探讨，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孔颜之乐”问题提出的意义或目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及其分歧，是宋明理学研究中的一个课题。“孔颜之乐”论则是指宋明理学家们在“孔颜之乐”问题的研究和探索过程中所形成的理论体系，为此，“孔颜之乐”论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展现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与变化的整体过程，侧重于揭示其内在的逻辑结构与思想旨趣。可见，虽然“孔颜之乐”问题与“孔颜之乐”论都属于宋明理学研究的范畴，但是二者又有明显不同：“孔颜之乐”问题，始终围绕着孔、颜“所乐何事”这一追问，侧重于梳理这一问题的思想史；“孔颜之乐”论的研究对象是儒家最高精神境界的理论问题，已经超越了“孔颜之乐”这一问题本身，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不同。如果说“孔颜之乐”是“六经”和“我注六经”，那么“孔颜之乐”问题是“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而“孔颜之乐”论则侧重于“六经注我”。概而言之，“孔颜之乐”研究的是孔子和颜回的思想，“孔颜之乐”问题所研究的是宋明诸儒对“孔颜之乐”的解读，而“孔颜之乐”论所研究的是宋明诸儒的境界论思想。换句话说，“孔颜之乐”论的研究是以“孔颜之乐”问题为主线和个案的、宋明理学中的境界论研究，只是它未必时时处处直接讨论“孔颜之乐”这一问题。

但是，“孔颜之乐”、“孔颜之乐”问题和“孔颜之乐”论三者又是紧密相联、层层递进、不可截然分开的。孔子和颜回之所乐（即“孔颜之乐”）是宋明理学中“孔颜之乐”问题研究的源起和核心，为此，“孔颜之乐”问题的研究离不开《论语》和对《论语》注解。“孔颜之乐”问题是“孔颜之乐”论研究的基础、主线和重要内容，“孔颜之乐”论的研究是“孔颜之乐”问题研究的延伸。虽然“孔颜之乐”论所涉及的内容包括宇宙论、本体论、境界论

和工夫论等,但是无论其内容如何变化,如何超越,始终没有离开“孔颜之乐”这一典型问题。也就是说,“孔颜之乐”论的研究只是从理论的高度上研究“孔颜之乐”问题。

研究任务由研究对象所决定。概括地说,本书的研究任务就是对宋明理学中的“孔颜之乐”论做历史的、系统的、理论的考察,揭示其理论发展的过程、内在的逻辑结构,把握其蕴含的思想旨趣和本质核心,探讨其理论的来源,从而对各种观点进行评价。具体地说,本书的研究任务有以下几个:

其一,揭示“孔颜之乐”论的发展过程。“孔颜之乐”论的发展过程经历了兴起、发展、转折和流变四个阶段。从天人关系看,此四个阶段是:合天道与人道二端、融人道于天道、化天道于人道、天道即人道或人道即天道;从思想旨趣看,此四个阶段是:同天即圣、尽性即圣、尽心即圣、即心即圣;从理论基础看,此四个阶段是:“气”宇宙论、“理”的宇宙本体论、“心”宇宙本体论、“心”“气”合一的宇宙本体论;从工夫进路看,此四个阶段各自的侧重是:“诚”“明”二者并进、自明而诚、自诚而明、诚明无二。

其二,总结“孔颜之乐”论的逻辑结构。一般而言,“孔颜之乐”论有四个组成部分即宇宙论、本体论、境界论和工夫论,虽然有时宇宙论与本体论二者合而为一即宇宙本体论,有时本体论、境界论与工夫论也融为一体形成本体—工夫论,但也不外乎此四个部分。此四者互为基础:宇宙论是本体论的基础,本体论是境界论的基础,境界论是工夫论的基础。或者说,此四者的逻辑关系是:由宇宙论而本体论,由本体论而境界论,由境界论而工夫论。境界论和工夫论是“孔颜之乐”论的核心和主体,宇宙论和本体论是“孔颜之乐”论的基础和依据。“孔颜之乐”论都是“天人合一”思维模式集中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孔颜之

乐”论也就是“天人合一”论。与之相应，其理论建构的逻辑过程主要有二种：或以天道观人道，或以人道反观天道。同样，在工夫论上也有二个层次或二个方面：立本与达用（或“极高明而道中庸”、或弘大与谨敬、或诚明与明诚）。

其三，把握“孔颜之乐”论的本质核心。佛家的目的在于成佛，而儒家的目的在于成圣。何之谓“圣”以及如何成“圣”也就成为“孔颜之乐”论的本质和核心。虽然在具体观点上存在诸多分歧，但亦可一言而尽之，“心与理一”或“心与道一”便是“圣”。以“乐”论观之，“孔颜之乐”境界就是“心与理一”或“心与道一”的境界。

其四，分析、评价“孔颜之乐”论的思想旨趣。虽然“孔颜之乐”的本质与核心可以概括为“心与理一”，但由于对“心”“理”“一”等概念内涵的理解不同，为此，在思想旨趣上也有着极大的差别。《礼记·乐记》说：“乐者，心之动也”、“致乐以治心”，也就是说“乐”以“心”言；又说：“乐也者，情之不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显然“礼”则以“理”言。由此，“孔颜之乐”的本质“心与理一”最为核心的一对范畴就是“礼”“乐”关系。对于“礼”“乐”关系，《礼记·乐记》说：“乐统同，礼辨异”、“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故乐也者，动于内者也。礼也者，动于外者也。故礼主其减，乐主其盈。礼减而进，以进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乐著大始，而礼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也。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① 若以《乐记》的“礼乐”

^① 《四书五经》，《礼记·乐记》，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81—388页。

关系看，“孔颜之乐”论的兴起阶段，礼乐并举，内外并进，天地并行，敬亲相生，同异相合，动静相即，故乐而不流，礼而不离，率乎中道；“孔颜之乐”论的发展阶段，以理主心，所谓“一心纯粹天理”实质是见理不见心，见礼不见乐，故主减主离，重异重文，敛藏肃杀之气有余，敦和生长之气不足，难免于粗而偏；“孔颜之乐”论的转折阶段，与兴起阶段相应，只是兴起阶段是二端合一，而转折阶段是一中有二。转折阶段，从“心即理”出发，以尽心即圣为思想旨趣，故一礼乐，冥内外，无动静，有情有理，有同有异，有减有盈，有进有反，有生有成，故始于礼而成于乐，始于地之静而终于天之动；“孔颜之乐”论的流变阶段，与发展阶段正好相反。发展阶段的思想旨趣是“乐在道中”，以礼消解乐，而流变阶段的思想旨趣则是“道在乐中”，有以乐消解礼的倾向，故重同重亲，主静主生，春生夏长之气有余，冬敛秋藏之气不足，难免于荡而流。

其五，探讨“孔颜之乐”的理论来源。虽然“孔颜之乐”论中的思想旨趣存在上述差别，但其最高境界是相同的，都是对现实、世俗的超越，对差异、对立、矛盾的消解，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儒、佛、道三家是相通的：儒家“与理为一”的“孔颜之乐”境界，也是《庄子》“道通为一”的“玄同”境界，亦是佛家“无二无别”的“圆融无碍”境界。因为相通，所以可以互用。换句话说，佛与道的“极高明”思想成为“孔颜之乐”论的重要来源。此外，儒家经典如《周易》、《礼记》（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也为“孔颜之乐”论的构建提供方方面面的材料。

二、态度与方法

在研究态度问题上,方立天先生在《中国佛教哲学要义》的《绪论》中引用汤用彤先生的一段话说:“佛法,亦宗教,亦哲学。宗教情绪,深存人心,往往以莫须有之史实为象征,发挥神妙之作用。故如仅凭陈迹之搜讨,而无同情之默应,必不能得其真。哲学精微,悟入实相,古哲慧发天真,慎思明辨,往往言约旨远,取譬虽近,而见道深弘。故如徒于文字考证上寻求,而乏心性之体会,则所获者其糟粕而已。”^①这段虽然主要是就佛学研究的态度来说,但是这一研究态度无疑对于整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都有重要指导意义,特别是对于以心性之学为主要内容,以人生超越为思想旨趣的“孔颜之乐”论的研究而言,更是具有特别的价值。

就态度而言,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既要入乎其内,也要超乎其外;既要实事求是、客观公允,又要“同情之默应”与“心性之体会”。或者说,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态度应该是“有我”与“无我”的统一,是“以我观物”和“以物观物”的统一。

所谓“入乎其内”,就是要把对象主体化,把前人的思想融入“我”之中,成为“我”之情、“我”之心,也就是汤用彤先生所说的“同情之默应”与“心性之体会”。以“我”观之,前人思想变成了“我”的思想,但以“前人”观之,则是“我”的思想成了前人的思想。为此,“有我”实际只是达到“无我”的一个重要途

^① 参见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绪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径：让“我”之心与“我”之情变成前人之心与前人之情，即把“我”消融于前人的思想之中，从而以前人之心、前人之思来看前人之书，只有这样才可能做到“入乎其内”，也只有“入乎其内”之后才谈得上不持成见、客观公允地去理解和分析前人的文献资料。借用邵雍的概念来说，“入乎其内”有二个过程：一是“以我观物”，就是要激发“我”内心中的情感，从而和研究对象产生共鸣；二是“以物观物”，就是让“我”之情、“我”之思成为前人之情与前人之思，进而以前人之情思理解和分析前人的文献资料。

所谓“超乎其外”，就是要跳出前人的思想之外，把主体置身于对象之外，只有这样才能作出比较全面、比较客观的审视和评判。这样的审视与评判固然是主体对客体的审视与评判，为此又是“以我观物”，带有主体的情感、体验与倾向，是“有我”。但是，主体的情感、体验与倾向并不是“私情”，而是具有一定根据和标准的，这个根据和标准用邵雍的话说就是“道”，即“以道观物”。只是这个“道”是指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的“道”，是贯穿于中国哲学发生和发展，过去和未来的整个过程的“道”。以是观之，“超乎其外”又是“无我”。可见，“超乎其外”，从表面看是“以我观物”，是“有我”；但从本质上讲又是“以道观物”，是“无我”。

就研究方法而言，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似可看成是对中国哲学史料的解释，在这一意义上，似可把中国哲学史学科当成是中国哲学史史料的解释学说。为此，在研究方法上有一个案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这就是美国宪法的解释学说。特别是对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充满争议又难以说清的“孔颜之乐”、“孔颜之乐”问题和“孔颜之乐”论来说，美国宪法第二修

正案中的各种解释学说更是具有借鉴意义。

“根据美国宪法学者的研究归类，联邦最高法院的解释学说大致可以细分为以下几种：文本论、原旨论、从严解释论、功能论、原则论、发展论、语境论和结构论等等。”^①这些解释学说给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借鉴和启示在于：我们在解读中国哲学史史料时实际已经不自觉地运用了这些观点和方法，只是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和归纳。按以上分类、观点和研究态度，本书的研究即解释有以下几种方法：

一是直诠。所谓“直诠”就是完全依据文本原义的有限诠释、直接诠释，或者说是字面含义的解释，包括文本论、原旨论和从严解释论。首先，以作者的意图来解释他的思想；其次，就文本而文本来解读；再者，按史料的原义从严解释，不添加研究者的个人意见。当作者原始意图明确时，则依据这些意图来解读史料；当作者原始意图不可得而知之时，便只能就文本而文本。但是，由于古代的文本使用的是文言，故必须以现代语言加以解释和说明，而这种解释和说明也完全遵循文本原义的有限解释与说明。然而由于中国哲学中概念的流动性与灵活性，有时很难找到一个相应的、完全符合原义的解释与说明，这时便直接借用原有的概念。

二是转诠。所谓“转诠”就是透过文本字面意思读出其“字里行间”的含义即第二义或称“转义”，“转诠”就是要把“转义”诠释出来。如何把“转义”展现出来？主要通过语境、结构、原旨、原则等等。“转诠”中尽管有了读者的主观能动性，但仍然

^① 东来、江振春：《从“持枪权”看美国宪法的解释》，参见《读书》2009年第8期，第20页。

还是忠实行于文本的原义，是文本本身就蕴含着的第二义，而不是任意地发挥。

三是变诠。所谓“变诠”就是超出文本的“原义”和“转义”，通过诠释发展出第三义，从而改变或超越了文本的原义，故称“变诠”。如果说“直诠”与“转诠”仍然是“我注六经”，那么“变诠”已经是“六经注我”了。简要地说，“变诠”有三种情形：(1)从文本的目的、原则、功能出发，进行能动地解释，从而建构出与文本不太一致或完全不同的理论；(2)从当前的需要出发，以服务当下为目的，有意对文本作出全新的解读；(3)从“道”的高度出发，^①对原文本作出符合“道”的全新解释。就“孔颜之乐”论的研究而言，这个“道”就是《周易》所说的“继善成性”，《礼记》中的“礼乐明备”，也是张载所说的“善述其事”、“善继其志”，亦即“生生之德”与“成物之事”。概而言之，这个“道”就是“心理为一”、“天人合一”、“内外同一”、“道通为一”。

以上三种诠释方法既有并列关系，更是递进关系，而且往往是互相交叉并用。“直诠”所得往往是物之表象，此时的“无我”相当于以形下之物观形下之物，然而这是解读文献资料最基础的工夫，没有“直诠”其余皆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如果只停留在“直诠”的层面上，所得只是皮毛，一如蜻蜓点水相似。“转诠”是介于“无我”与“有我”之间，须要研究者结合自身的“觉解”，所谓“同类相从，同声相应”，同情相感，否则便难以看透字里行间的深意。“变诠”是“有我”的创造阶段，也是“以道观物”的最高阶段，从形式上看是对文本的远离和变异，是“有我”

① 这个“道”是指统摄贯穿于一切的“道”，小至一门学科、一个专题，大至整个宇宙。

“有为”的结果,但从内在精神上看却是对文本的本质与灵魂的接近和把握,又是真正“无我”“无为”的自然。

三、选材与结构

在选材上,本书并没有把宋明理学中的所有重要思想家都列入考察范围,如陆九渊、曹端、王畿等就没有单独加以考察。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他们的思想不重要,也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论及“孔颜之乐”的问题,而主要是由本书的结构所决定:本书对“孔颜之乐”论的考察是以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为主要依据或方式,故以“孔颜之乐”论的兴起、发展、转折、流变为逻辑主线展开,目的在于揭示其理论发展、变化的过程。尽管有些理学家们对“孔颜之乐”问题也有所阐述,但以这条逻辑主线来看,他们的“乐”论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或者处于旁枝的地位。换句话说,考察的依据、方式与目的决定了材料的取舍、人物思想地位在文中的主次。如果以谨严、洒落二条主线进行考察,那么在人物的选取上就可能有所不同。

在结构上,本书按“孔颜之乐”论的历史的、逻辑的发展过程,分为:来源、兴起、发展、转折、流变等五章。在理论来源上,依儒、释、道三家,分成三个方面,但根据内容的多寡和内外之别,^①把儒单独列出而把释、道合为一节。而“乐”论的兴起、发展、转折、流变四章,重点在于阐明“乐”论各个阶段的划分依据、理论建构、主要内容、主要特征等等,故各节中的内容大致按

^① 以“孔颜之乐”论看,儒家自有的思想来源自然是“内”,而释、道则是“外”。